

『民主女神』号

破产记

华言 编著

新华出版社

『民主女神』
号破产记

华言 编著

新华出版社

“民主女神”号破产记

华言 编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625印张 插页2张 127,000字

1991年9月第一版 1991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3,200册

ISBN 7-5011-1147-2/D·206 定价：2.80元

(内部发行)

前 言

1990年5月27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一条令人瞩目的新闻：“由台湾和海外反动势力一手策划的‘民主女神’号广播船，企图在公海对我国大陆进行旨在颠覆我国政府的海盗广播活动，已被迫取消。这一非法广播活动的前台人物25日在台北和东京两地宣布，目前停留在台湾基隆港的这条船将被‘当作一艘货船’拍卖掉。”

与此同时，世界各大通讯社及报刊也都报道了“民主女神”号广播船宣布破产并将被拍卖的消息。

“女神”号广播船落到如此田地，是其策划者、组织者和支持者们的始料不及的。想当初，该船在法国西海岸启航时，又是剪彩，又是演讲，又是发布新闻，闹得沸沸扬扬，神气十足，满以为会一帆风顺直驶中国东南沿海水域，向中国大陆进行颠覆性宣传，妄图在“北京风波”一周年之际，重新煽起动乱。岂料，这不过是黄粱美梦而已，到头来只落个千夫所指，债务缠身，落荒而逃的可耻下场。

“女神”号广播船计划的失败绝非偶然。就在这条海盗广播船3月18日从法国拉罗谢尔港出发后，中国外交部发言

人就把事情的本质讲得很清楚：“所谓‘民主女神号’这条船，是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的活动工具之一，它的活动目的是颠覆中国政府。”“支持这条船在中国沿海水域或公海，对我国大陆进行颠覆性的广播，是违反国际法有关规定的，也是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这是我们不能容许的。”

中国政府的这一严正立场，得到世界上坚持正义的人们的理解和支持，他们纷纷谴责“女神”号的非法活动。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反华不得人心，从而注定了“女神”号彻底破产的命运。

“女神”号海盗广播船，从3月18日自法国启航到5月25日宣布破产，拍卖抵债，仅仅69天；但从1989年11月酝酿策划算起，却长达半年之久。其中有的主要事件，新闻媒介已作过一些报道，但是其全过程和细节，特别是复杂的幕后活动与彻底破产的内外因素，却鲜为人知。

为了使国内读者较详细地了解“民主女神”号广播船事件的全过程，研究其前因后果和必然失败的原因，加深对一小撮叛逃的动乱“精英”及国际与台湾反共势力的认识，我们编写了这本《“民主女神”号破产记》。

本书主要内容有：“民主女神”号从幕后策划到破产的全过程和具体情节；叛逃分子与台湾及国际反动势力互相勾结、利用而又矛盾重重的关系；动乱“精英”在海外进一步暴露其反动面目，妄图在内外交困中挣扎的丑态；还附有台湾记者随船采访日志摘录，细致描述了“女神”号航行的情景、出现的问题及船员心态等。

在编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地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国内外电讯、报刊有关“女神”号的报道、评论、背景材料、札记、日志、文件，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人士的历次表态，及“国际海洋公约”等材料；力求全面、客观、正确地把这场反华反共闹剧的台上台下、幕前幕后的情况及复杂背景，介绍给读者。

我们认为，这本书有助于理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深远意义，研究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战胜国内外反动势力。

当我们写完最后一个句号，放下手中的笔，回首历史长河中这个小小的风波，总结我们与少数敌对分子斗争的胜利时，我们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这就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坚强的，是不可战胜的，任何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阴谋都不会得逞。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社会主义中国正迎着风浪奋勇前进！那些已经遭到失败的国内外敌对势力，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可耻的结局。

编著者

1990年8月

目 录

第一章 “女神”出笼	(1)
《当代》杂志发难	(2)
台湾插手	(6)
粉墨登场	(15)
如意算盘	(21)
第二章 夜海孤帆	(25)
“命名式”闹剧	(25)
难耐的孤寂	(29)
频频犯病的“女神”	(30)
“印度洋遇风暴”之谜	(33)
草木皆兵	(36)
巴黎传来噩耗	(40)
新加坡：望城兴叹	(42)
第三章 四面楚歌	(45)
《联合报》中途变卦	(45)
严正的警告	(46)

	“中国有权取缔海盗广播”	(49)
	美国和西方拒绝支持	(54)
	台湾被迫转变腔调	(57)
第四章	南海惊魂	(61)
	改航香港	(61)
	偷渡南海	(64)
	香港拒瘟神	(67)
	台湾确定“三原则”	(70)
	潜艇风波	(74)
	有家难回	(78)
	渔船支援夭折	(80)
	苦等进港	(82)
第五章	彻底破产	(86)
	隔舷相拥	(86)
	警戒森严	(89)
	发射机被扣	(90)
	七个不许和奉命刁难	(93)
	严家其泪洒台北	(96)
	“女神”遭嘲讽	(101)
	最后的挣扎	(103)
	卖船抵债	(106)
附录:	台湾《联合报》记者丘彦明随船采访	
	日志摘录	(110)

第一章 “女神”出笼

1990年3月17日晚，法国西海岸的拉罗谢尔港，经过一天的繁忙、喧嚣之后，随着夜幕的降临开始变得宁静起来。阵阵寒风夹带着浓厚的海腥味，从海面上不停地袭来。码头及港湾里的船只上，点点电灯的光芒在闪烁着、抖动着。海面上，波涛涌起，不断拍打着海岸，发出雷鸣般的轰响。

7时30分，一艘经过重新装修的、涂着红白二色的旧船，悬挂着拉美国家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国旗，随着涨起的潮水，顶着劲吹的寒风，孤孤单单，摇摇晃晃地驶出了内港，停靠在外港码头。18日凌晨零时，在夜雾笼罩之下，这艘散发着刺鼻的油漆味的船，解掉了系在岸边的最后一根缆绳，滑进了汪洋大海。

它，就是由台湾和海外反动势力一手策划的“民主女神”号广播船。如今，它要离开拉罗谢尔港，驶向我国东南沿海附近的国际水域，进行旨在颠覆我国政府的广播活动。

拉罗谢尔港，是法国一个很小的古老港口，今天它的重要性虽然远不及马赛港等法国的大港口，但在历史上有它的

地位。二百年前，它是运送非洲黑奴到美洲大陆的船只的中途停泊地，也是二百年前法国第一艘从事贸易的帆船，驶往遥远的东方——中国的出发点。据法国人士说，那是发生在18世纪90年代的事，也就是我国清朝乾隆年间，法国一些航海家兼贸易商，带着本地的工农业产品，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东南沿海，与当地民众进行易货贸易。他们留下了法国的特产，带走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等用品。想不到二百年后的今天，又会有一艘船从这里出发，前往中国东南沿海。但是，明显的不同是，昔日东去的船开创了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与交往，而今这艘“女神”号的东航，却是包藏着一个反华反共大阴谋。

《当代》杂志发难

这个“女神”号东航计划的始作俑者，是法国《当代》杂志主编克里斯托夫·尼克。此人在1989年北京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时，被该杂志社派来采访。他与摄影记者马纽埃尔一起，搜集和拍摄了不少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极不友好的材料和照片。回到法国后，他们在《当代》杂志上发表了一些吹嘘暴乱分子，攻击我国政府和军队的文章与图片。1989年秋，尼克与“民主中国阵线”一伙人策划了“文传自由到中国”的反华活动。

所谓“文传自由到中国”，就是这伙人预先收集到了我国的机关、学校、企业、旅馆等单位数千台电话传真机的号

码，然后通过文传机向这些单位传送“民阵”的反华反共材料，企图借此在广大群众中散布谣言，制造混乱。这一阴谋活动在《当代》杂志的支持下，于1989年10月26日开始，持续了大约一两个星期。他们纠集了西欧、北美14家报刊杂志，分别在各自刊物上刊登收集到的我国文传号码，并让这些报刊在发行时，夹送由“民阵”伪造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其他反共文件。“民阵”一伙人在1989年我国国庆节时，散发伪造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他们卑鄙地利用《人民日报》曾刊登过的文章的标题，塞进他们充满反共反华内容的私货，借以混淆视听，迷惑群众。他们还呼吁这14家报刊的读者向中国各地文传这些反动材料。例如，美国的《洛杉矶周报》，据说发行量16万份，它就在其刊物中夹送同样数量的“伪报”及其他反共材料，并在刊物上刊登了6000个中国大陆的机关、学校、企业的传真号码，要求读者参加这一与中国人民极不友好的所谓“文传”活动。

《当代》杂志社社长让-弗朗索瓦·比佐，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声称，这一行动“旨在向设在人民中国的并属于企业、旅馆、大学和使馆的5200台电话传真机发送消息，以便打破‘沉默的墙’。”

当然，他们的这个“文传”阴谋活动，在伟大的中国人民面前是失败了。

然而，碰得鼻青脸肿的尼克并不甘心失败，一个新的花招又在他的脑海中产生。据说，尼克在“绿色和平运动”利用船只开展反对核试验、反对捕鲸和污染环境等活动的“启

发”下，突发奇想，认为也可以搞一艘船到中国东南沿海去向大陆广播。

关于“绿色和平运动”，读者可能不会生疏。经常收看电视新闻节目的读者，就会看到这样的画面：一些乘着小船或橡皮艇的人们，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围绕那些或携有核武器、或捕杀海洋动物、或污染环境的大船和军舰，举行示威，企图阻止它们出海航行。他们就是“绿色和平运动”的成员。“绿色和平运动”是一个国际性环保主义组织，1970年在加拿大成立，是由加拿大和美国的一些环境保护主义者发起的，现有成员50多万。该组织的宗旨是：反对进行核试验，反对捕鲸，反对运输核废料，反对环境污染等。20年来，这个组织活动频繁，对保护生态环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85年3月，该组织成员租来一艘平底船（长48米、自重449吨），命名为“彩虹战士”号，在夏威夷岛等太平洋地区开展反对美国核试验的抗议活动，在夸贾林岛反对美国从加利福尼亚州发射洲际导弹。同年7月，这艘船停在新西兰的奥克兰港，准备去法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核试验基地——穆鲁罗瓦岛，反对法国进行该试验。结果被法国国外安全总局的特工人员炸沉，成为世界瞩目的重大事件。最后，以法国政府向新西兰正式道歉，赔偿“绿色和平运动700万美元损失和给两名法国特工人员判刑3年而了结此案。

尼克的“也搞一条船向中国大陆广播”的主意，立即获得《当代》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让-弗朗索瓦·比佐的赞同。

《当代》杂志在法国本来“没有多大名气和影响力”，它

“常为某个特定的主题宣传造势”，火上加油，企图在读者中扩大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以增加订阅份数。据一位西欧资深记者说，由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局势相继发生了变化，“东西欧之间的冲突已经变小，不再是世界注意的重心，”因此，欧洲各传播媒体莫不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寻求90年代读者关心的重点”。《当代》杂志社长兼总编辑比佐认定，尼克提出的“流动的海上电台”设想如果成功，肯定会轰动世界，这是为该杂志“博得更大名声的好时机”，何乐而不为呢？“想在90年代为自己打开世界知名度的企图”，促使该杂志竭尽全力支持尼克去筹划并发起这一罪恶勾当。

1989年11月，尼克的所谓“广播船构想”逐步具体化，可是经费来源成为首要问题。于是，他找到“民阵”巴黎总部。说明来意后，立即得到严家其、万润南等人的支持。这帮处于困境之中的叛逃分子，对尼克的构想欣喜若狂。因为：第一，他们可藉此直接向中国大陆进行颠覆性宣传，并借以改变“民阵”内部无休止的纷争和无所作为的局面。第二，“民阵”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利用广播船活动或许可以筹措到一笔巨款再供他们挥霍。第三，借此机会加强与西方新闻界和港台反共势力的联系。

据台湾《自立晚报》报道，“民阵”参与这一阴谋活动，其中还有一段故事。据“民阵”某核心人物说，广播船计划正式在“民阵”中提出，是在1989年12月8日。那天，“民阵”的主要头目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理事会会议。当时，

吾尔开希和万润南提出了参与广播船计划的事宜，但这俩人对其中许多具体情况缺乏了解，一问三不知；而且，准备购买的船只当时要价25万美元，也难以解决。结果，遭到与会理事的否决。1989年12月30日，事情发生了转变。“民阵”副秘书长许天方到达美国，参加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举办的“大陆问题座谈会”。许氏借机向“民阵”理事会重新提出参与广播船的计划。由于他“能言善辩，了解内情，讲得头头是道”，遂为理事们所接纳。然而，这时买船的最低价格已升到40万美元。

“民阵”一些分部及其他组织的负责人，听到这一消息后却表示，他们“不想参加广播船活动”，因为这一活动要动用上百万美元的经费，经济拮据的“民阵”“不如将这笔巨款用于别处更好些”。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则批评广播船计划的整个构想是“旨在宣传多于实效，华而不实”。

“民阵”理事会虽然批准了参与广播船计划，但是，依靠外国和台湾反动势力施舍过活的“民阵”，无论如何也拿不出买这条船所需的40万美金来。

台湾插手

可是，野心勃勃的尼克并没有因为资金难筹而作罢。他一面将1989年10月份曾联合向中国大陆发动“文传攻势”的那十几家欧美报刊，重新纠集起来，筹组了“中国之船协会”——一个专门为策划“女神”号广播计划而拼凑的组

织；一面把购船的打算和资金困难的事，告诉给台湾《联合报》报系在巴黎办的《欧洲日报》社长杜怡之，请求给予支持，杜怡之当即表示愿意协助。12月中旬，《联合报》董事长王惕吾的女儿、台湾《民生报》发行人王效兰，从台湾来到巴黎，尼克立即求见并与之交谈达两个多小时，王效兰对购船计划满口答应全力“赞助”。几天后，尼克又与“民阵”副秘书长、发言人许天方会面，请他协助筹款。许夸下海口：半月之内要在亚洲筹足100万美元经费。

半月之后，许天方果然弄到一大笔美金。1990年1月4日，他打电报给尼克，说他已筹到41.8万美元，其中40万美元1月15日付清，可用于购船。

许天方有什么神通，在短短几天内就筹到几十万美元巨款，他是在哪里弄到这笔钱的？

答曰：在台湾。

原来，1989年圣诞节前后，许天方陪同万润南以“民运人士”身份到台湾“参观访问”，四处活动，乞求台湾方面的援助，筹措购船经费。许天方和万润南在台湾活动期间，除与台湾官方有着密切关系的《中国时报》和“中国电视公司”分别答应各提供13万美元外，其余14万美元则由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提供。许天方说，所筹之款都是来自“民间”。

然而，台湾《自立晚报》的一篇报道却戳穿了许天方的谎言。这篇报道透露，1989年12月间，台湾国民党“文工会”主任祝基滢在美国访问时，就得知“民阵”正在筹划

“广播船”的事，但因缺乏经费而陷入犹豫困惑之中。祝基澧立即同也在美国的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主任委员马树礼联系会商。在马树礼的首肯下，“大同盟”答应提供14万美元给“民阵”，尚需的其余26万美元经在场的人士洽商后，决定由《中国时报》和“中国电视公司”分摊。就这样，在祝基澧、马树礼当场拍板下，凑足了购船所需要的40万美元。

据“民阵”一名核心人物说，万润南当天就把台湾“大同盟”提供的14万美元支票带回了巴黎，交给了尚在筹组中的“中国之船协会”。

上述情况清楚地说明，在购船经费方面，台湾国民党当局是直接出了钱的。但“民阵”头头们为什么硬是坚持说，都是来自“民间”呢？

1990年4月30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刊登的一篇文章道出了个中奥秘，耐人寻味。现抄录如下，供读者鉴赏：

“在中国民主运动昙花一现一年之后，台湾正在给持不同政见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大部分经费，控制着刊登他们的辩论的报纸，密切监视着他们的活动。……由于持不同政见者对他们提供资金的行动是敏感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国民党很少直接向流亡组织捐赠现金。（国民）党的资金是通过象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这样明显的私人机构汇集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在美国唐人街设有办事处。这个大同盟、台北的《联合报》和同国民党有着密切联系的机

构 更经常地协调由各个不同私人机构提供的资金。这样，持不同政见者便可以声称，给他们提供的资金是来自台湾企业和私人，尽管国民党老朋友充当这些交易中的中间人。”

由此不难看出，“民阵”和“女神”号广播船，从台湾方面得到的巨额财政资助，不管是捐助或赠款，是来自“民间团体”或“私人机构”，都是在台湾国民党的有关官方机构或官方人士的“经常协调”下达成的肮脏交易。

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并非私人机构。这个“大同盟”自1983年成立以来，一贯坚持反共立场，积极进行反共活动。1989年以来，这个“大同盟”为了更密切配合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策略，妄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与反动组织“民阵”和其他叛逃分子加紧勾结，积极支持他们的反共活动。这个“大同盟”起初是以“民间团体”面目出现的，1989年10月，它终于撕去了那块遮羞面纱，堂而皇之地向台湾“内政部”登记为政治团体。它的领导机构——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大多是在台湾“党、政、军”方面担任过或担任着要职的国民党要人，如1989年改选后的第五届常务委员中，就有李焕、李璜、谷正纲、郑为元、马树礼、张建邦、陈立夫、蒋彦士、宋楚瑜等等。国民党前秘书长马树礼再次当选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马树礼在1989年的报告中，谈到这个“大同盟”今后的工作方向和目标时，声称要“强化并发展大同盟组织，把台湾经验加速输入大陆地区”，要“积极整合海外民运组织，使他们……认同中华民国宪法和体制”，要通过海外有关管道，协助政府